

蘇聯軍方在國防決策中的角色

蔡昇輝

一、前言

今日的蘇聯已是世所公認能與美國相抗頡的軍事強國，其軍事發展動向自爲世人所矚目，也應爲國人所關心；原因是蘇聯的軍事力量足以改變美蘇戰略均衡態勢，左右美國與中共的關係，並進而影響美我關係。

筆者試以個人所累積有關蘇聯軍事問題（如黨軍關係、軍人的政治地位與角色、國防決策、軍事戰略、美蘇戰略關係等等）的知識爲基礎，對蘇聯軍方在國防外交決策（下文中簡稱國防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一通盤的整理與研究，儘量避免斷章取義，作到客觀平實。

爲探討蘇聯軍人在國防決策中的角色，本文首先描繪蘇聯的國防決策系統，看是那些單位扮演主要角色？誰在做決策？軍人在決策中的地位又如何？其次，試舉一些個案，說明那些範疇爲軍方所關注？參與情形如何？又如何影響決策？一般人咸認蘇聯軍人的決策角色遠不如其諮詢角色，而忽略其重要性。殊不知蘇聯政治領袖普遍缺乏軍事專業知識，又無文職機構可供輔佐，一切國防計劃均需仰賴軍人。再者，本文對西方學術界論爭已久的、有關蘇聯領袖行爲的根源與研究方法，亦可提供一些參考資料。深刻而有系統的研究蘇聯軍事問題，其利至少有三：（一）可掌握蘇聯軍事動向；（二）可發現蘇聯政治的本質與運作方式；（三）可預測蘇聯政治系統的演進。

二、蘇聯國防決策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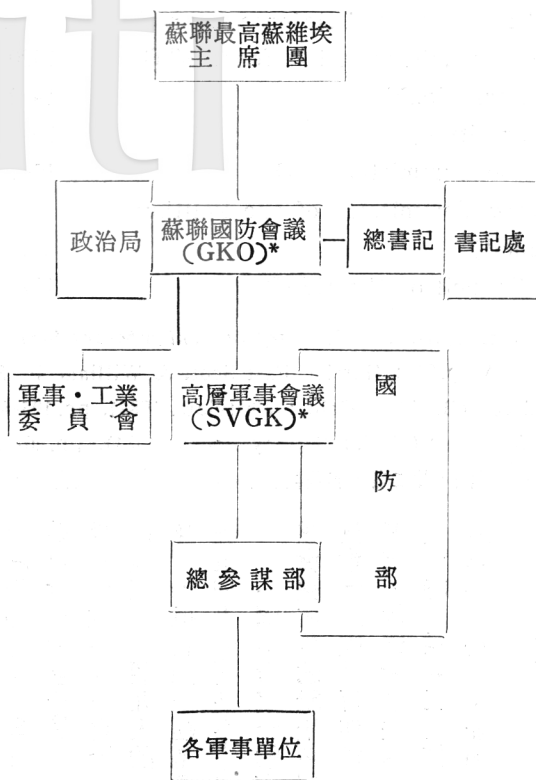
1. 概念性的結構

在描繪該體系之前，爲免於混淆，首先界定蘇聯「國防」及「外交」問題。前者涉及軍事政策、軍事教條（doctrine），軍事戰略、軍事科學、軍事理論（theory），以及國防經費，武器發展、生產與部署，國防研究與發展（R&D）的趨向。後者則包括國外危機、軍事干涉與威脅、武器管制等。這些問題將在後文中陸續論及。

西方政界與學術界先前常視蘇聯國防決策系統有如謎樣東西，如今雖已撥雲見日，但仍難免衆說紛紜，令人莫衷一是。約在七〇年代初，西方學者即已論述蘇聯國防決策系統，其層次是由上而下，分別是「政治局」與「書記處」、「國防會議」、「國防部」、及各有關的國防工業部^①。及至八〇年代中期，另有專書將戰前蘇聯的國防決策體系由下往上論析，依次為「高層軍事會議」、「國防部」、「總書記」（史達林）、「政治局」、「國防會議」，再經政府指令，下達給國防部的「總參謀部」，以至各軍事單位^②。以上二說有關「國防會議」對「政治局」的關係，陳述各異，前者強調層次的分明，後者除層次分明外，僅多指出情報的傳遞而已。兩者皆忽略了指揮體系的運作。

必須先了解戰時的蘇聯指揮體系，方可瞭解國防決策的過程與決策機構間的相互關係。另外，「國防會議」既非在「政治局

圖一 蘇聯國防決策簡要體系



*戰時名稱。GKO：國防委員會；SVGK：最高總司令部大本營。

之上，也非在下，而是在其內（詳見下節）。本此二前提，可以描繪出蘇聯國防決策體系的輪廓（如圖一）。依據蘇聯新憲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十四款，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有權「組織蘇聯國防會議及批准其成員，並任命及免除蘇聯武裝部隊最高指揮人員」^③。「國防會議」之下直屬者為國防部的「高層軍事會議」，而國防部的「總參謀部」則為其執行機構，將指令下達各軍事單位^④。

2. 國防會議

長久一段時間，蘇聯「國防會議」（Defense Council）的存在，一直是個謎，及至一九七六年五月布里茲涅夫擢升為「蘇聯元帥」時，方始揭露出來^⑤。其正式名稱伴隨不同領導者與不同時期，每有更

- 註① 參見 Matthew P. Gallagher & Karl F. Spielmann, Jr., *Soviet Decision Making for Defense* (N. Y.: Praeger, 1972), pp. 18-20.
- 註② 參見 Jiri Valenta & William C. Potter, eds., *Soviet Decisionmaking for National Security* (London, Boston, & Sydney: Allen & Unwin, 1984), pp. 34-43. 有關蘇聯國防決策的研究方法與模式，此書提供詳盡的論述。
- 註③ *Konstitutsiya (Osnovnoi zakon) Soyuza Sovershiikh Sotsialisticheskikh Respublik* (Moscow: Politizdat, 1977), p. 43.
- 註④ 見表一與表三資料來源。
- 註⑤ *Krasnaya zvezda (Red Star)*, May 9, 1976. 另一資料指出一九七三年春即有「國防會議」，見表三註中 *Warnar* 一書。

蘇聯軍方在國防決策中的角色

工農國防會議 (Workers' and Peasants' Defense Council)	1918. 11~1920. 3
勞動與國防會議 (Council for Labour and Defense-STO)	1920. 3~1937. 4. 25
國防委員會 (Defense Commission)*	1932. 5~1937. 4. 28
國防委員會 (Defense Committee)*	1937. 4. 28~1941. 6. 30
國防委員會 (State Defense Committee-GkO)	1941. 6. 30~1945. 9
政治局軍事委員會 (Military Commission of the Politburo)	?
國防會議 (Defense Council)	1964. ?~1977. 10
蘇聯國防會議 (Defense Council of the USSR)	1977. 10—

[資料來源：Edward L. Warner, III, *The Military in Contemporary Soviet Politics* (N. Y. : Praeger, 1977), Appendix A, p. 272; Harriet Fast Scott & William F. Scott,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SSR*, 3rd ed. (Boulder, Colo. : Westview, 1984), pp. 105-8; and also Viktor Suvorov, *Inside the Soviet Army* (N. Y. : Berkley Books, 1984), pp. 40-2.]

*根據蘇瓦洛夫 (Suvorov) 的說法，此二者可能是戰前的「政治局軍事委員會」。

易 (見表一)，而其重要性端視其與政治局的關係、其成員與功能而定。

一位投誠西方的蘇聯將領 (署名爲 Victor Suvorov) 指稱，二次大戰前後的國防會議爲政治局的「軍事委員會」(Military Commission)，並且肯定現今的「(蘇聯)國防會議」確實存在於政治局之內^⑥。此一說並非毫無根據，很多片段資料與此相脗合。某些西方學者也持同一看法，視史達林時代的「國防委員會」(Defense Committee) 與布里茲涅夫時代的「國防會議」爲政治局的「小組委員會」(subcommittee)^⑦。根據赫魯雪夫的說法，戰後史達林在政治局內部設立各種「委員會」(commissions)，在蘇共「十九大」(一九五二年)時，更提議成立一個九人的「局」(Bureau)，以取代過於龐大的主席團(政治局的前身)，但實際上經常邀請「五人核心小組」(inner circle of five) 來負責一切決策^⑧，而此五人小組極似戰時「國防委員會」(GKO) 的翻版。

「國防會議」的存在雖已公開於世，但其成員却仍是一個謎。截至目前，有關該會議成員的說法多屬臆測，不過若配合過去的經驗，仍足供參考。戰時「國防委員會」的成員可作爲一標準範例。當時的成員有史達林(主席)、莫洛托夫(副主席)、伏羅希洛夫(國防)、貝利亞(安全)、與馬林可夫(黨務)^⑨。至「十九大」時，該「五人核心小組」包括史達林、馬林可夫、貝利亞、赫魯雪夫、布加寧(參考註^⑩)，亦即莫洛托夫與伏羅希洛夫已爲史達林所排除^⑩，而赫魯雪夫爲史

註^⑥ Viktor Suvorov, *Inside the Soviet Army* (N. Y. : Berkley Books, 1984) pp. 38-40.

註^⑦ Valenta & Potter, eds., *op. cit.*, pp. 90 & 123. Also Douglas F. Garthoff, "The Soviet Military and Arms Control," *Survival*, Vol. XIX, no. 6 (Nov.-Dec. 1977), p. 245.

註^⑧ Nikita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Boston: Little & Brown, 1970), Appendix 4, p. 614. 此九人乃是 Stalin, Malenkov, Beria, Khrushchev, Bulganin, Voroshilov, Kaganovich, Saburov, Pervukhin.

註^⑨ Suvorov, *op. cit.*, p. 41. Also Valenta & Potter, eds., *op. cit.*, p. 54.

註^⑩ See Khrushchev, *op. cit.*, pp. 276-82 & 615.

達林所刻意提携的人物，正好取代莫洛托夫，布加寧則以同為軍人身份取代伏羅希洛夫。至於赫魯雪夫時代的國防會議與其成員，目前仍無跡可尋，即使他的回憶錄也不曾提及。

綜合各方資料，布里茲涅夫時代的「(蘇聯)國防會議」成員可能包括下列人物：布里茲涅夫——總書記，狄洪諾夫(N. A. Tikhonov)及其前任柯錫金(A. N. Kosygin)——部長會議主席，安德羅波夫(Yu. V. Andropov)——國安會主席，烏斯汀諾夫(D. F. Ustinov)及其前任葛瑞契科(A. A. Grechko)——國防部長，葛羅米柯(A. A. Gromyko)——外交部長，基里連科(A. P. Kirilenko)——主管工業，蘇斯洛夫(M. A. Suslov)及其後的契爾連科(K. U. Chernenko)——主管意識形態，與包戈尼(K. V. Podgorny)——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⑩。布氏死後，安德羅波夫繼任總書記，隨後兼任「蘇聯國防會議」主席^⑪。安氏以後的「蘇聯國防會議」可能由主席契爾連科(總書記)、戈巴契夫(M. S. Gorbachev)——主管農業、意識形態、外交)、羅曼諾夫(G. V. Romanov)——工業、安全)、狄洪諾夫(政府)、烏斯汀諾夫(國防)組成。此外，葛羅米柯(外交)、切布里科夫(V. M. Chebrikov)——國安)與斐多楚克(V. V. Fedorchuk)——內政)亦可能參與出席，而總參謀長奧加可夫(N. V. Ogarkov)則被認為出掌該會議的「秘書處」(secretariat)^⑫。

若將上述人員與職責對照「表二」中幾個危機時期的政治局「核心內閣」(多半西方專家認係「國防會議」本身)，當不難斷定「(蘇聯)國防會議」最可能由總書記(或兼國家元首)、部長會議主席團主席、國防部長、外交部長、國安會主席、及主管意識形態與重工業(或國防工業)的領導人組成。依此推斷，現時的「蘇聯國防會議」成員可能包括主席戈巴契夫(總書記)、葛羅米柯(國家元首)、里茲可夫(N. I. Ryzhkov)——政府首長)、利加秋夫(E. K. Ligachev)——主管黨組織)、札伊可夫(L. N. Zaykov)——主管工業)、謝瓦納茲(Ye. A. Shevardnadze)——外交部長)等政治局委員，另外可能包括國防部長索科羅夫(S. L. Sokolov)——政治局候委)與國安會主席契布利可夫(政治局委員)^⑬。

至於國防會議的功能，蘇方軍事資料確有明文規定。譬如，「國防委員會」(GKO)仿照內戰時的「工農國防會議」組成

註⑩ Cf Harriet Fast Scott & William F. Scott,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SSR*, 3rd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4), p. 99. And also Garthoff, *loc. cit.*, p. 245-6.

註⑪ *Pravda*, May 9, 1983. 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於文中首稱「蘇共中委會總書記、蘇聯國防會議主席、安德波波夫同志」。

註⑫ Scotts, *op. cit.*, p. 107.

註⑬ 參考蘇共領袖在十月革命紀念日與勝利紀念日(V-E Day)等重大慶典時，位立紅場列寧墳墓上的相對位置與變化。見 *Krasnaya zvezda*, May 2 & Nov. 8, 1985, 及 May 2, 1986. 今年勝利紀念日時，國防部長索科羅夫未像其前任烏斯汀諾夫指稱安德波波夫為「蘇聯國防會議」主席(見註⑩)，因此，戈巴契夫可能尚未任該會議主席，或僅暫行代理主席職位。

表二 蘇共政治局危機處理核心小組

危機名稱	核心小組	資料中的名稱	主要成員(職務) a
古巴飛彈危機 (一九六二年)	核心內閣 (inner cabinet)	六人(主要為政治局委員)	
以阿戰爭 (一九七三年)	核心人員 (inner core)	布里茲涅夫(總書記)、包戈尼(元首)、科錫金(政府)、葛羅米柯(外交)、格烈契科(國防)	
出兵阿富汗 (一九七九年)	核心小組 (inner group)	布里茲涅夫(總書記、元首)、安德羅波夫(安全)、葛羅米柯(外交)、科錫金(政府)、蘇斯洛夫(意識形態)、烏斯汀諾夫(國防)、波諾馬廖夫(候委、國際部) ^b	
波蘭危機 (一九八〇年)	外交決策小組 (foreign policy-making group)	布里茲涅夫(總書記、元首)、基里連科(工業)、蘇斯洛夫(意識形態)、狄洪諾夫(政府)、安德羅波夫(安全)、烏斯汀諾夫(國防)、葛羅米柯(外交)	

a 表中的成員為原作者依報導資料或依成員的職務與活動情形來判斷推定的。

b 可能的成員。

資料來源：1. Edward L. Warner, III., *The Military in Contemporary Soviet Politics* (N.Y.: Praeger, 1977), p. 44.

2. Jiri Valenta & William C. Potter, eds., *Soviet Decision-Making for National Security* (London, Boston & Sidney: Allen & Unwin, 1984), pp. 192 212 & 226.

3. Henry S. Bradsher, *Afganistan and the Soviet Union* (Durham, N. C.: DPPS, 1983), p. 163. (See also Valenta & Potter, *op. cit.*, p. 226.)

4.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6, 1981, p. A31.

，為國家與武裝部隊的最高領導機構，負責「快速動員所有部隊抵禦外侮」，及「建立一個完善協調與快速成長的軍事經濟」。而「蘇聯國防會議」在戰時的功能即如「國防委員會」(GKO)者^⑤，其重要性自非尋常。

3. 高層軍事會議：

西方學者常將「高層軍事會議」(Main Military Council)與「國防會議」混為一談。實則後者存在於政治局之內，而前者乃是國防部的一個集體會議(colligium)，也是部內各「軍事會議」(military councils)網中的最高機構。在指揮系統上，前者直接隸屬於後者(見圖一)。

由時間上來，「高層軍事會議」幾乎與「國防會議」同時演進(參考表三與表一)。平時，「高層軍事會議」為國防部的諮詢與政策檢討機構，負責領導武裝部隊、戰鬥、動員、政治與軍事訓練等事務。該會議由國防部長任主席，其它成員包括第一副國防部長、副國防部長，與「國防會議」主席(總書記)^⑥。在軍事作戰指揮系統上，另有類似的機構負責。誠如索科羅夫斯基(V. D.

註⑤ See V. D. Sokolovsky, et al., eds., *Military Strategy: Soviet Doctrine and Concepts* (N.Y.: Praeger, 1963),

pp. 359-64&367. Quoted in pp. 359&360, respectively.

註⑥ *Sovetskaya Voennaya Yentsiklopediya* (SY Ye) (

Moscow: Voenizdat), Vol. 4 (1977), p. 235 & *Soviet*

Military Power, 4th ed.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pp. 14&18.

表三 高層（或最高）軍事會議的演進

最高軍事會議 (Supreme Military Council)	(1918. 3. 4~1918. 9. 2)
(俄羅斯) 共和國 (Revolutionary Military Council of the Republic—RVSR)	(1918. 9. 2~1923. 8. 28)
蘇聯革命軍事會議 (Revolutionary Military Council of the USSR)	(1923. 8. 28~1934. 6. 20)
軍事會議 (Military Council) 1.	(1934. 11. ~1938. 3. 13)
陸軍 海軍	> 高層軍事會議 (Main Military Councils of <the Red Army the Navy)
	(1938. 3. 13~1941. 6. 23)
	(1938. 4. ~1941. 6. 13*)
總司令部大本營 (Stavka of the High Command)	(1941. 6. 23~1941. 7. 10)
最高司令部大本營 (Stavka of the Supreme Command)	(1941. 7. 10~1941. 8. 8)
最高總司令部大本營 (Stavka of the Supreme High Command—SVGK)	(1941. 8. 8~1945. 9. 4*)
最高軍事會議 (Supreme Military Council)	(1947. 1 ~1953. 3*)
戰爭部 海軍部	> 高層軍事會議 (Main Military Councils of <the War Ministry the Naval Ministry)
	(1950. 3~1953. 3)
	(1950. 3~1953. 3)
高層軍事會議 (Main Military Council)	(1953. 3~)

1. 作為「國防人民委員部」的諮詢機構，成員有八十人。

*其終了時間取至下列資料來源中 Warner 一書。

[資料來源：Sovetskaya Voennaya Yentsiklopediya (Moscow: Voenizdat), Vol. 2 (1976), pp. 113-4, 272-4, 439-40, & 566-7, and also Vol. 7 (1979), pp. 79-80 & 511-2. 此外，西方資料詳述(列)此一會議者有：Marshal V. D. Sokolovsky, et al., eds., *Military Strategy: Soviet Doctrine and Concepts* (N. Y.: Praeger, 1963), pp. 349-64; Harriet Fast Scott & William F. Scott,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SSR*, 3rd.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4), pp. 108-11; also Edward L. Warner, III, *The Military in Contemporary Soviet Politics* (N. Y.: Praeger, 1977), Appendix B, pp. 274-5.] 唯上述西方資料對該一會議的名稱及起訖時間或有謬誤，或有疏漏，甚或不一致。

Sokolovsky) 所言，「第二次世界戰爭時領導全國與武裝部隊的積極經驗，仍可適用於現時代」^⑦。另美方出版的《蘇聯軍事力量》更加說明「最高總司令部」(Supreme High Command—VGK) 為平時最高作戰指揮中心，其成員由國防部長索科羅夫，第一副國防部長阿赫羅梅耶夫 (S. F. Akhromeyev——總參謀長)，庫立科夫 (V. G. Kulikov——華約部隊總司令)，彼得羅夫 (V. I. Petrov——主管行政事務)，及利吉契夫 (A. D. Lizichev——總政治部主任)，副國防部長兼戰略火箭部隊總司令馬克西莫夫 (Yu. P. Maksimov)，空防軍總司令部都諾夫 (A. I. Koldunov)，地面部隊總司令伊凡諾夫斯基 (E. F. Ivanovskiy)，空軍總司令耶菲莫夫 (A. N. Efimov)，及海軍總司令契爾納文 (V. N. Chernavin)，與總書記戈巴契夫組成^⑧。戰時，「高層軍事會議」則改成「最高總司令部大本營」(Stavka of the Supreme High Command—SVGK)，負責「直接

註^⑦ Sokolovsky, et al., eds., *op. cit.*,

p. 366.

註^⑧ *Soviet Military Power*, pp. 15&18.

領導武裝部隊」，且是個「集團領導機構」，而「中委會第一書記與政府首腦」任「最高總司令」(Supreme Commander in Chief)⑳。一九四一年八月八日，史達林以總書記、人民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最高總司令部大本營首腦的身份，再兼「最高總司令」之職，並享有特別全權，使政、軍、經等事務與政策得以統一策劃與協調㉑。

國防部「總參謀部」(General Staff)平時直屬於「高層軍事會議」(與「最高總司令部」)，負責管理部隊、維持高度的戰爭準備、及準備戰時的戰略作戰計劃；戰時則作為「最高總司令部大本營」的執行機構(main agency)，負責管理作戰部隊與執行作戰命令。此外，「總參謀部」可就有關軍事政策與戰略等問題，諮詢「國防會議」㉒。若論規模，「總參謀部」遠勝於「高層軍事會議」與「國防會議」，是蘇聯國防決策體系中，權力「集中化」(centralization)過程裏的重要環節。

由上述國防結構的內涵，明顯地看出，蘇聯軍人在組織與成員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雖然在「(蘇聯)國防會議」裏，國防部長(如烏斯汀諾夫、格瑞契科、朱可夫、布加寧、伏羅希洛夫等)頂多祇有一票的決定權，而某些國防部長(如索科羅夫、馬林諾夫斯基)甚或還無此投票權，但在情報蒐集與決策討論方面，「最高總司令部」(或「高層軍事會議」)却往往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因在危機時，該機構，如同外交部、國安會等單位㉓，提供情報上達政治局(與「國防會議」)研擬，俾作成初步決議。然後，該決議重又轉交「最高總司令部」(或「高層軍事會議」)討論後，決策方始完成。《蘇聯軍事百科全書》對此一過程，作了明確的說明，即「在討論總參謀部所作出有關準備軍事戰役與戰略作戰、以及各陣線(艦隊)司令所作有關進行作戰的提議後，最高總司令部大本營方始作成重要決定」㉔。索科羅夫斯基的《公軍事戰略》一書指出，第二次大戰時的「所有重大決定」是在各陣線司令、軍種總司令、師長等參與下，「經過討論由最高總司令部(大本營)作成的」㉕。根據另一資料，布里茲涅夫亦遵循此一原則㉖。有關資料亦曾報導前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在慶賀赫魯雪夫七十生日時，宣稱蘇聯國防政策是在與「

註⑳ Sokolovsky, et al., eds., *op. cit.*, p. 367.

註㉑ SV Ye, Vol. 2 (1976), p. 113. 史大林之前的「最高總司令」是克利連科(N. V. Krylenko)，時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至一九一八年三月五日。

註㉒ Sokolovsky, et al., eds., *op. cit.*, p. 367 & *Soviet Military Power*, p. 18.

註㉓ 有關國防部、外交部、國安會、黨政中央各部在情報資料蒐集所扮演的角色與轉呈過程，參看 Jan F. Triska & David D. Finley, *Soviet Foreign Policy* (N. Y.: Macmillan, 1968)。

註㉔ SMYe, Vol. 7 (1979), p. 511.

註㉕ Sokolovsky, et al., eds., *op. cit.*, pp. 361 & 364.

註㉖ 參看 Suvorov, *op. cit.*, pp. 40-2. 不過，該書同時指出戰時的國防決策機構為 GKO 與 SVGK，那麼書中有關國防政策先於「國防會議」中製定，然後才在「高層軍事會議」中討論的說法，似與史實不符。

總參謀部的代表商議後制定的」^②。以上資料充分顯示軍方在國防決策體系中的角色與功能。蘇聯領袖在面對國防、外交危機時，一切情報來源、軍事專業知識、處理危機方案，皆得仰賴軍方。所以，軍人藉著「高層軍事會議」或「最高總司令部」的諮議功能，往往能影響「國防會議」的決策。在戰時，許多決定還是他們制定的。雖然軍人在國防決策體系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布里茲涅夫似乎有意扭轉文人的劣勢，不讓軍人勢力過大，而有所謂的「私人書記處」(personal secretariat)或「克里姆林宮幕僚團」(Kremlin staff)之設，亦即藉助國防、外交專家，以提升自身的權威^③。儘管如此，軍方的角色仍是不可忽視的。誠如一位蘇聯軍事問題專家寇頓所言，「蘇聯沒有類似中情局(CIA)、武器管制與裁軍總署(ACDA)、或蘭德(RAND)等私人諮詢機構」^④。蘇聯國防機構承擔了其中大部份作業。

三、蘇聯軍方影響國防決策的範圍

紐讀蘇聯政軍史，不難發現軍方在許多國防、外交事例中，扮演甚為積極的角色。雖然軍方未必絕對左右決策，但其立場却是蘇共領袖所不可忽視的。下文逐一說明在軍事干涉、國外危機、戰略思想、武裝部隊的裁減、國防部的改組、武器管制談判等個案中，軍方參與的情形。

1. 軍事干涉

當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革命時，蘇共主席團內部曾有三派思想與行動路線之爭^⑤。軍方中立派在匈牙利總理納奇(Imre Nagy)廢除一黨專制與退出華約後，改變了態度，轉而支持武力干涉。當時國防部長朱可夫元帥的立場對不忠於蘇聯的匈國陸軍的制裁方法，起了決定性作用，他同意「動員大量蘇聯坦克、高砲、及機械化步兵」^⑥。當華約部隊總司令科涅夫(I. S. Konev)元帥被問及需幾天方能恢復匈國秩序時，他回答「頂多三天」，接著就受命進行出兵計劃^⑦。最後終由喀爾巴陸軍區司

註⑤ Kravtsova zvezda, April 7, 1964.

註⑥ 見 Valenta & Potter, eds., *op. cit.*, pp. 68&78.

註⑦ Quoted in Timothy J. Colton, *Commanders and Civilian Authority: The Structure of Soviet Military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44. 有關軍人作為專家所扮演的角色，參閱 pp. 241-9.

註⑧ George Mikes,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London: Deutsch, 1957), p. 86. 此書乃有關蘇共主席團(政治局)因匈國革命所引起的權力鬭爭與決定的最佳資料。參閱著者 Severin Bialer, "Three Schools of Kremlin Policy," *The New Leader*, July 29, 1957.

註⑨ Rey A. Medvedev, *Khrushchev* (Oxford: Black Well, 1982), p. 109.

註⑩ 參閱 Khrushchev, *op. cit.*, pp. 418-9.

令巴托夫 (P. I. Batov) 率軍進犯匈國²³。

一九六八年捷克自由化運動時，蘇聯領袖徘徊在干涉與不干涉的兩難之間²⁴。當時，贊成干涉的軍事將領有華約部隊總司令雅庫鮑夫斯基 (I. I. Yakubovskiy)、參謀長斯切敏科 (S. M. Shtemenko) 及地面部隊總司令帕夫洛夫斯基 (I. G. Pavlovskiy) 等人。他們因不滿「布拉蒂斯拉瓦會議」(Bratislava Conference) 的結果，並且認為捷克的改革運動是危險的舉措，因此傾向干涉派。但軍方立場並非皆一致，部份將領如卡札科夫 (M. I. Kazakov)²⁵ 與戰略火箭部隊總司令克利洛夫 (N. I. Krylov) 等反對出兵²⁶。當布里茲涅夫不得已投出贊成票時²⁷，帕夫洛夫斯基受命率領五國聯軍侵捷。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當年四月，總政治部主任耶匹雪夫 (A. A. Yepishev) 率領一批將領赴阿；八月末至十月，地面部隊總司令帕夫洛夫斯基至喀布爾訪問，他們的使命可能影響侵阿的決定。此外，土耳其斯坦軍區司令馬克西莫夫及其政戰部主任羅丁 (V. S. Rodin) 與中亞軍區第一副司令哥察科夫 (V. Gorchakov) 皆可能因地緣關係，贊成入侵²⁸。關於軍方在侵阿決策中的影響力，一直是西方蘇聯專家辯論的焦點。軍方可能不願將已捲入阿富汗事件的顧問、司令、及技術人員撤離。但布里茲涅夫個人與耶匹雪夫及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之間的關係，可能使軍方的觀點具有影響性²⁹。蘇共選派耶匹雪夫與帕夫洛夫斯基 (兩者皆為侵捷的有力支持者，況且後者還是侵捷聯軍總司令) 前往阿富汗，似乎暗示蘇聯出兵的決心。

2. 國外危機

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前後，戰略火箭部隊總司令莫斯卡連科 (K. S. Moskalenko)、駐東德部隊總司令科涅夫、總政

註²³ Malcolm Mackintosh, *The Evolution of the Warsaw Pact* (Adelphi Papers, no. 58; London: ISS, June 1969), p. 16.

註²⁴ 有關蘇聯官僚集團針對捷克事件的權力鬥爭與勢力消長，參看 Valenta, *Soviet Intervention in Czechoslovakia, 1968: Anatomy of a Decis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註²⁵ 卡札科夫原任華約部隊參謀長，且曾任六月華約部隊演習時的總司令，於「布拉蒂斯拉瓦會議」後兩天，為斯切敏科 (史達林的崇拜者) 所取代。*Ibid.*, pp. 109-10. 卡札科夫又曾任蘇聯駐匈牙利部隊司令 (一九五六—一九六〇)，可能因了解侵略後果而反對出兵捷克。

註²⁶ 克利洛夫可能因捷克總統諾沃尼 (A. Novotny) 於一九六六年允許蘇聯戰略專家與武器駐紮捷境 (而地面部隊的駐紮却為杜布西克所反對)，而反對軍事干涉，見 *Ibid.*, p. 109.

註²⁷ 布里茲涅夫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曾對捷克改革主義者西蒙 (B. Simon) 解釋說：「假使我不會投贊成軍事干涉的票，你猜想將有何事發生？當然你不會坐在這裏。甚至可能我也不會坐在這裏。」引自 *Ibid.*, p. 144.

註²⁸ 參閱 Henry S. Bradsheer, *Afghanistan and the Soviet Union* (Durham, N. C.: DPPS, 1983), pp. 150-3, and Valenta, "Decisionmaking on Afghanistan, 1979," in Valenta & Potter, eds., *op. cit.*, pp. 225 & 236, n. 22.

註²⁹ Bradsheer, *op. cit.*, p. 158.

治部主任加利科夫 (F. I. Golikov) 及總參謀長札哈洛夫 (M. V. Zakharov) 皆被撤職，極可能是因為他們反對赫魯雪夫的古巴冒險政策與戰略觀點之故^④。

蘇聯對越戰所持的立場，可由軍人參與的情形看出端倪。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華約部隊參謀長巴托夫訪問北越；次年一月，中央書記安德洛波夫表示拒絕北越所要求的軍事援助。這兩人皆曾積極參與匈牙利事件，一為侵匈部隊司令，另一為駐匈大使。蘇共當局似乎想利用他們的活動作為使用武力的暗示，期使美國政府有所節制。越戰發生後，總政治部主任耶匹雪夫在蘇共廿三大（一九六六年）中報告：「所有（蘇聯軍隊）單位人員正準備前赴越南。」同時，蘇聯領袖對越戰的看法頗不一致。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與黨中央書記謝烈平 (A. N. Shelepin) 同認美國「比希特勒還糟」，危及蘇聯利益；但布里茲涅夫、科錫金、包戈尼則認為越戰是孤立事件。在巴黎協定（一九七三年一月）後，國防部長葛瑞契科與第一副國防部長索科羅夫分別聲明以武力支援友好國家的義務^⑤。

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寶島事件引發一連串的中蘇邊境衝突。在此一危機中，沒有明確資料證實蘇聯政、軍領袖間有嚴重的意見分歧。蘇聯除在遠東擴充六個師外，並在外貝加爾軍區與黑龍江地帶舉行軍事演習。《紅星報》當時宣稱在痛擊敵人（指中共）後，已獲得令人誠服的勝利^⑥。同時，當年五月，飛彈專家托魯布科 (V. F. Tolubko)——往後的戰略火箭部隊總司令——調任遠東軍區司令，他曾於八月初談論民國十八年的中蘇衝突，因此，他的任命乃是對中共的「警告」。總參謀長札伊洛夫也暗示有突襲中共的可能性。次年七月，蘇聯限武談判首席代表謝敏諾夫 (V. S. Semenov) 甚至呼籲美蘇聯合對抗另一核子國家——中共^⑦。

一九八〇年末，當波蘭危機正熾時，蘇聯地面部隊因贊同鎮壓，致在該年十二月與次年一月間，十三位高級將領易職，其中包括與波蘭接壤的軍區級司令及其政治部主任。在新任人員中，彼得羅夫、波普可夫 (M. D. Popkov)、札伊切夫 (M. M. Zaytsev)、哥瓦洛夫 (V. L. Govorov) 及魯雪夫 (P. G. Lushv) 分別就任地面部隊總司令及政治部主任，駐東德部隊與

註^④ 赫氏的古巴冒險政策詳載於 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至於赫氏與美參議員甘迺迪的溝通，參閱 Robert F. Kennedy, *Thirteen Days: A Memoir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 Y.: Norton, 1969)。

註^⑤ See details in Stephen S. Kaplan, et al., *Diplomacy of Power: Soviet Armed Forces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1981), pp. 98-105 & 336-50. Quoted in pp. 102n & 343, respectively.

註^⑥ *Ibid.*, pp. 140-1.

註^⑦ Scotts, *op. cit.*, p. 198, & Kaplan, et al., *op. cit.*, pp. 141-3.

遠東部隊總司令、莫斯科軍區司令，且皆直接或間接與布里茲涅夫有關聯。布氏最後投出決定性的一票，反對武力干涉^④。

由上述武力干涉與危機事例中，可知軍人涉及有關國防決策情形。當政軍領袖意見相同時，軍方的立場與意見往往成爲政治領袖合理化行爲的依據；反之，軍事將領常遭到革職或易職的命運。軍方內部的立場與意見往往紛歧不一，而成爲政治領袖操縱軍方系派的機會。

3. 軍事改革

在蘇聯軍事史上，曾有三次重大改革（二〇、五〇及七〇年代）^⑤，其中第二次改革關係軍人的地位至鉅。

史達林死後，軍人在戰略思想方面，逐漸嶄露頭角，表達其對戰略理論的意見^⑥。一九六〇年一月，赫魯雪夫推行重大的戰略革新。依其說法（頗類似先前馬林可夫的看法），「國際緊張已逐漸緩和」，「戰爭不再不可避免」，「突擊（surprise）也不利於任何一方」，而且「海、空軍已失去其以往的重要性」，武裝部隊並已將重點轉向「火箭與核子武器」^⑦。赫氏的戰略理論乃是基於國際緊張的緩和與核子武器的嚇阻，推翻了「平衡發展原則」（the principle of balanced development）^⑧。

軍人對赫氏的改革，反應不一。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雖同意未來戰爭「不可避免」是核子戰爭，但最後的勝利仍將取決於「各軍、兵種的聯合行動」與「數百萬大規模的武裝部隊」^⑨。傳統戰場部隊（theatre forces）對新戰略理論的懷疑最大，反

註④ 有關蘇聯軍方人事的更易，布里茲涅夫先後不同的立場，及其它詳情，參閱 Richard D. Anderson, Jr., "Soviet Decision-Making and Poland,"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rch-April 1982, pp. 22-36. See also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6, 1981, p. A31.

註⑤ 關於此三次軍事事務革命對蘇聯武力部署的影響，參閱 William E. Odom, "Soviet Force Posture: Dilemmas and Directions," *Problems of Communism*, July-August 1985, pp. 1-14.

註⑥ 一九五〇年代蘇聯戰略思想的啓蒙與發展，及其對政軍關係的影響詳載於下列資料中：H. S. Dinerstein, *War and the Soviet Union* (N. Y.: Praeger, 1959); Raymond L. Garthoff, *The Soviet Image of Future War* (Washington, D. 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59); Garthoff, *Soviet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 2nd ed. (N. Y.: Praeger, 1962); and Sheng-huai Tsai, *Political-Military Relationship in the Khrushchev Era: The Military's Growing Importance in Soviet Politics*, an unpublished REEU M. A. Thesis of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May 31, 1985.

註⑦ *Pravda*, January 15, 1960.

註⑧ N. Galay, "The Soviet Approach to the Modern Military Revolution," in John Erikson, ed., *The Military-Technical Revolution: Its Impact on Strategy and Foreign Policy* (N. Y.: Praeger, 1966), p. 22.

註⑨ *Pravda*, October 25, 1961. 同樣言論者尚有朱可夫 (Zhukov, August 7, 1956 & February 13, 1955) 及庫拉索夫 (V. Kurasov; *Voen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 3, March 1961, pp. 6-7) 等將領。

對也最強，結果導致所謂「傳統派」(traditionalists)與赫魯雪夫，及「傳統派」與「激進派」(radicals)間的爭執。前者包括地面部隊、海軍、空軍，後者則包括上述軍種的現代化兵種、戰略火箭部隊、及赫氏的支持者。兩派彼此企圖說服政治領袖，並爭取其同情^④。一九六二年五月出版的《軍事戰略》基本上頗合馬林諾夫斯基的觀點。該書係由諸多高級將領合編，且經國防部批准出版，可見軍中不滿赫氏主張的情形，以及軍方力圖主導戰略思想的趨勢。

赫氏一面創新戰略思想，一面削減武裝部隊及重建國防部結構。一九六〇年一月，他宣佈裁減一百二十萬人^⑤，主要是地面部隊、傳統海軍、戰術空軍、及各種支援單位。依馬林諾夫斯基的估計，約二十五萬名軍官被解職，而在此以前的六年中，僅有百分之三十五左右的退職軍官獲得適當工作^⑥。華約部隊總司令科涅夫與總參謀長索科羅夫斯基可能因反對新戰略構想而被革職^⑦。因此，不難理解，後來軍人對赫氏的倒臺漠不關心。在國防組織結構方面，由於赫氏強調新戰略思想，戰略火箭部隊(RVSN)遂於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誕生，首任總司令為尼捷令(M. I. Nedelin)^⑧。此一軍種甫自成立，即躍居五大軍種之首，為「最高司令部」(Supreme Commands)的主要力量^⑨。地面部隊(如同其它軍種)也成立飛彈部隊，作為「基本武器」，並獲得發展上的「優先」^⑩。國家空防部隊(National PVO)於一九四八年成為獨立軍種，由「司令」指揮，至一九五四年時，則改稱「總司令」，首任為哥瓦洛夫(L. A. Govorov)^⑪。很明顯，此一軍種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當赫氏圖使海軍現代化時，總司令庫茲涅佐夫(N. G. Kuznetsov)強烈反對赫氏削減在傳統海軍方面的投資，致被剝奪軍階，引發其餘軍人的不滿。不

註④ See Roman Kolkowicz, "The Military," in Gordon H. Skilling & Franklyn Griffiths, eds.,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46-8.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Krasnaya zvezda*, January 20, 1960. 數月後，四百五十四位將領(其中十九位升上將，一百四十位升中將，及兩百九十五位升少將)獲得晉陞(Pravda, May 9, 1960)，以彌補已被解職者，不過新任者較忠於赫氏罷了。

註⑦ Yosef Avidar, *The Party and the Army in the Soviet Union* (Jerusalem: The Magnes Press, The Hebrew University, 1983), p. 276. 有關赫氏裁減軍力及軍方的反響，參看 Gallagher, "Military Manpower: A Case Study,"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y-June 1964, pp. 53-62.

註⑧ 尼捷令以主管武器裝備的副國防部長兼任該總司令，但旋即於隔年十月一次飛彈試爆中喪生，由莫斯卡連科所取代。Scotts, *op. cit.*, p. 145.

註⑨ Sokolovsky, et al., eds., *op. cit.*, p. 225.

註⑩ *Ibid.*, p. 227.

註⑪ 國家空防部隊於一九八一年改名「空防部隊」(V PVO)，見 Scotts, *op. cit.*, p. 159.

註⑫ *Ibid.*, pp. 159-60.

過，新任總司令高希可夫（S. G. Gorskov）也僅是能接納赫氏的想法罷了，並非如外界所言具有改革思想，因其在接任之初，曾回答赫氏說：「以前我從沒聽過飛彈發射計劃。你正告訴我嶄新的東西」^㉔。

總之，赫氏的軍事改革催促戰略火箭部隊的誕生，強化空防部隊的重要性，但同時削弱傳統軍、兵種的地位與力量。高級將領的反對與異議雖曾使赫氏有所節制，但並沒有使其改弦更張，畢竟蘇共是武裝部隊的「組織與指導力量」^㉕。但赫氏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高，因為在政治鬭爭危急時刻，唯有地面部隊與軍機（如同一九五七年的情形）最可能也最適合作緊急支援。布里茲涅夫的平實穩健領導方式（不似赫氏的變幹作風），使得他與軍人的關係甚為密切，而軍方在軍事事務方面也較有發揮餘地，因而政軍關係遂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4. 武器管制

一九六三年六月，「禁試條約」（Test Ban Treaty）的簽署引發蘇聯軍方某種程度的反對。雖然一些軍事評論家（如Vershinin）稱讚該條約為「和平共存政策的一項新成就」^㉖，但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則隻字不提，*△紅星報▽*也不讚譽該約（而其它報紙却熱衷於報導）。軍方似乎不願接受容許美國軍事、技術佔優勢的事實^㉗，其中反對最烈者則是空防部隊與戰略火箭部隊^㉘。

至於「限武談判」（SALT），起先軍方領袖頗表懷疑，意見不一致，如空防部隊欲建立反彈道飛彈（ABM）系統，因此反對簽署「反彈道飛彈條約」（ABM Treaty）^㉙。過份限制戰略武器的不良後果，正如一位蘇聯軍事評論家所說，「太過強調傳統武器的重要性比完全依賴核子武器是『更嚴重的錯誤』」^㉚。後來，軍方逐漸了解限武不見得對其不利，其態度遂也轉趨緩

註㉔ Fore more details, see, "The Fall of Admiral Kuznetsov" & "The Role of Admiral Gorshkov," in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p. 19-28 & 28-34 respectively. Quotation from p. 29. 赫氏有關史大林時代之即有建立現代化海軍的說法，獲得蘇瓦洛夫的證實。早在一九三八年七月，政治局會通過一個決議（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ceangoing fleet），那時高希可夫僅不過是位驅逐艦的司令，見 Suvorov, *op. cit.*, p. 107.

註㉕ Sokolovsky, *op. cit.*, p. 235.

註㉖ Quoted in Warner, *op. cit.*, p. 232.

註㉗ See Robert Conquest, *Russia after Khrushchev* (N. Y.: Praeger, 1956), p. 186.

註㉘ D. F. Garthoff, *loc. cit.*, p. 243.

註㉙ 有關軍方的懷疑與意見不一，以及其它細節，參考 R. L. Garthoff, "The Soviet Military and SALT," in Valenta & Potter, eds., *op. cit.*, pp. 136-61; Gallagher & Spielmann, Jr., *op. cit.*; Thomas W. Wolfe, "Soviet Approaches to SALT,"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ember-October 1970, pp. 1-10; & D. F. Garthoff, *loc. cit.*, pp. 242-50.

註㉚ Quoted in Mackintosh, "The Soviet Military: Influence on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ember-October 1973, p. 10.

和。國防部長葛瑞契科與總參謀長庫立科夫對「第一階段限武協定」支持最力^⑤。

蘇聯軍方以專家的身份，協助政治領袖擬定武器管制政策與談判立場。在為期十年的限武談判過程中，出席談判或作為顧問者有奧加可夫、阿烈克謝耶夫(N. N. Alekseev)、特魯索夫(K. A. Trusov)、貝烈茨基(I. I. Beletskiy)、格利茲洛夫(A. A. Gryzlov)及斯塔洛都洛夫(V. P. Starodurov)等人；另外，留在莫斯科的布氏助理尚有科茲洛夫(M. M. Kozlov)、阿赫羅梅耶夫(現任總參謀長)及阿夫斯基(I. A. Afonskiy)。再者，先後兩位國防部長葛瑞契科與烏斯汀諾夫皆在「第二階段限武談判」(SALT II)中扮演主要的角色^⑥。可以說，軍人在有關武器談判方面，克盡專家的功能，同時也最能發揮其影響力。不過，軍人的角色並非毫無限制。在一九七二年及七三年的談判過程中，沒有軍人參與美蘇高峯會議。此後，高級軍人代表如科茲洛夫(一九七四年六月及十一月)、奧加可夫(一九七七年三月與一九七八年十月)、烏斯汀諾夫(一九七九年六月)皆曾參與當時的高峯會議，足見蘇聯軍人在武器日益進步的時代中已逐漸成為文人領袖所不可或缺の助手。反觀美方談判代表，一向皆為文人，直至一九七九年始派國防部長伯朗與烏斯汀諾夫會談^⑦。

在檢討上述個案後，可以大略明白軍人在蘇聯國防、外交政策方面，通常扮演顧問的角色，少有參與最高決策的。但因其擁有文人領袖所欠缺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使其在影響國家安全與利益的重大事件中，得以積極參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決策。各軍事將領在訪問危機發生的當地國後，返回莫斯科報告(理應向「高層軍事會議」、「國防會議」、「政治局」報告危機實情或提出建議)，似乎已成例行公事。在武器管制方面，軍人的角色尤其顯而易見。除在談判過程中發揮專家的功能外，軍人也負責監視一些武器管制協定的施行，並且充任蘇聯駐「常設諮議委員會」(Standing Consultative Commission)的首席代表，以監督一九七二年的限武協定；而美方却透過文人或外交管道來執行任務^⑧。兩相比較，蘇聯軍人的影響力遠較美方為高。

四、結語

在蘇聯國防決策細節嚴格保密的情形下，西方世界唯有仰賴片斷資料來推斷事實真相，因此，疏漏或誤判似乎在所難免。本

註⑤ See R. L. Garthoff, "The Military and SALT," in Valenta & Potter, eds., *op. cit.*, p. 140.

註⑥ *Ibid.*, pp. 142-5 & 156.

註⑦ *Ibid.*, pp. 145-6.

註⑧ D. F. Garthoff, *loc. cit.*, p. 244.

文藉可能資料，描繪蘇聯國防決策體系的重要環節：「國防會議」、國防部內的「高層軍事會議」（或「最高總司令部」）與「總參謀部」。依據危機時期的點滴報導，「蘇聯國防會議」由已知的成員總書記（主席）及可能的成員國防、外交、安全、黨務等首長組成。現今的國防部長索科羅夫（政治局候委）是否為「國防會議」成員，仍未能十足判定。不過，可以斷定該會議若無索科羅夫的列席討論，頗令人難以理解。至於軍人在「高層軍事會議」與「總參謀部」的角色，則無庸置疑。

在戰時，「蘇聯國防會議」是全國最高政治、經濟、軍事領導機構，但在武裝部隊的戰略領導方面，却是「最高總司令部大本營」，而「總參謀部」作為其執行機構。既然重要決策皆在討論後，由「最高總司令部大本營」制定，那麼軍人在戰時的決策角色自可肯定。至於在涉及使用武力的危機中，軍人的決策功能似乎不明顯。

在上述國防、外交個案中，軍方人物扮演不可低估的諮議角色。若說能接觸上層決策機構或最高決策者，即能發揮影響力，那麼軍方的確有此種力量。儘管如此，軍人的角色與影響力仍將視事件的性質與危機的遠近而定。在其專業領域或與其利害攸關，如限武談判、戰略地位、戰略思想的革新、武裝部隊的規模、國防組織的改組等事務中，軍方顯然較為關注，參與度也較高；反之，介入決策的機會較低，意見的表達（articulation）也不彰顯。當危機發生在蘇聯邊境或東歐國家內，如中（共）蘇衝突、捷克自由化運動、匈牙利革命、波蘭危機、與阿富汗事件等，軍方採取比較強硬的立場，且因部隊的調派與部署、作戰計劃的擬定與執行，往往使其能發揮莫大的影響力或直接參與決策；在偏離蘇聯國土的危機，如古巴危機、越戰等，蘇聯政府多半採取政軍聯合行動（political-military operations），即使用武力來支援外交政策，謀求解決危機^⑧，軍方也採取比較審慎的低姿態。至於軍人影響決策的能力，則視國內外情勢而定。當有關政策需要軍人支持時，不論其是否動用武力，軍人作為顧問（甚或決策者）的角色使其影響力大增。但當政軍領袖的觀點完全或趨近一致時，往往難以區分政策由誰發起。軍方為了實現其利益，經常透過私人關係（如葛瑞契科與布里茲涅夫，朱可夫與赫魯雪夫）、利用政治鬭爭（如馬林可夫與赫魯雪夫之間）、訴求政治保護者（如科茲洛夫——F. R. Kozlov）、甚或投合領導者的觀念與偏好（如楚伊可夫的支持赫氏裁軍計劃），以便間接影響國防決策。

除非蘇共願意減少依賴軍人支持的政治目標，否則在國防科技日益進步、精良武器愈趨繁複、國際危機接踵而至，以及對外承諾與援助與日俱增的情況下，蘇聯軍方在國防決策中的角色將益發重要。

（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完稿）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約聘助理研究員）

註⑧ 有關蘇聯政府探行政軍聯合行動，以應付危機的事例與細節，參考 Kaplan, et al., *op. cit.*, esp. Part Two: Case Studies, pp. 205-637.